

中国近代史丛书

戊戌变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戊戌变法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戊戌变法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375 字数 46,200

1972年7月第1版 197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204 定价: 0.13元

毛主席语录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

毛主席语录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重要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目 录

- 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 1
- 二、康有为最初的活动····· 6
- 三、走向政治改良运动····· 11
- 四、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 19
- 五、死抱住一个皇帝····· 31
- 六、围绕着保国会的斗争····· 40
- 七、一百零三天的新政····· 47
- 八、顽固派发动政变····· 55
- 九、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 64

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

一八九八年中国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政治运动——戊戌（音物须 wùxū）变法。这次运动也叫戊戌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特别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尖锐的矛盾下产生的。

那时候的中国，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一次又一次打败，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中法战争，又发生中日甲午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或十几年，资本主义侵略者就要对中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迫使清朝政府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把独立的中国变为由它们宰割的半殖民地。

这些资本主义侵略者，就是英国、法国、美国、沙俄、德国和后起的日本等等，一个一个闯进中国，横行霸道，凭借不平等条约，一面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一面又侵占中国周围的邻邦作为基地，把魔爪伸入中国的边疆。从海上到陆上，从东北到西南，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它们更在“利益均沾”的借口下，不但

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办工厂，筑铁路，开矿山，设银行，争夺贷款，大量输出资本，摧毁中国社会经济的每一个堤岸，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并且纷纷强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准备瓜分中国。

资本主义侵略者这种无止境的侵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然被清朝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下去了，但是中国人民的反抗并没有一天停止。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地会党以“打富济贫”、反洋教相号召，开展了此伏彼起的群众斗争。到九十年代，城市贫民和乡村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遍及全国十多个省份，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更连绵不断地掀起反洋教斗争的巨浪。其中四川余栋臣的起义，发布檄（音习 xí）文，痛斥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英勇抗击清军的围剿，影响达到三十多个州县，标志着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在向更大的规模发展。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震惊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到中法战争的八十年代，已逐步汇合成为一股怯懦的改良主义思潮。

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产生而出现的。在七、八十年代，沿海各省先后开办了五十个左右的近代企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员，逐步向资产阶级转化，他们开始感到光凭儒家学术和八股文一类旧学问，已不能适应新的

环境,想从中挣扎出来,探讨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向西方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以实现他们解救民族危难和缓和社会矛盾的愿望。他们不甘心帝国主义的奴役,要求自强。他们也耽心清朝政府将被日益扩大的群众反抗风暴淹没,主张通过革新把它拯救出来。这表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刚以新的姿态出场,在忠诚救国的宣言下,就掩盖着麻痹人民和欺骗人民的作用。

向西方学习,是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课题。但那时的中国人,能到外国直接接触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只有极少数外交官和留学生。国内知识界的西学来源,除了得自这极少数人的辗转传闻外,主要依靠这样几个方面:一、一八六二年清朝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员,也译述一些以“公法”为主的外国书。所谓“公法”,是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法规。二、一八六五年洋务派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译述洋务工业必需的技术知识,也有少量政法方面的书。三、为了侵略的需要,窜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很早就出版书报,散布麻痹中国人民的“基督文明”。一八八七年,英美传教士在上海设立的广学会,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文化侵略机构,发行了《万国公报》,出版了一百多种书,主要是宗教书,也有一些是从殖民主义要求出发的政法、历史书。这些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能取得的西学资料。他们从这些书刊中,吸取了有关声、光、化、电的粗浅科技知识,也从中获得了一些国际形势和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

在改良主义思想酝酿的过程中,最早较明显地提出这种

主张的，是广东的容闳。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首倡者，自称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就是说要按照资本主义的面貌来改造中国。他回国后，到太平天国访问，向洪仁玕提出过革新意见。在六十年代，又多次向清朝的洋务派官僚兜售他的改良建议，想依靠一种政治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改良主张。其后较有名的有王韬（音掏 tāo）、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在八十年代前后，写书、写文章，发挥变法言论，在知识界形成为一股缓慢的思潮。这些人属于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大都同洋务派官僚有很深的关系，也同外国传教士有密切的来往。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以抵制资本主义的侵略，认为洋务派专搞“制造”，只是西学的皮毛，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少采取了一点批评的态度。这就使他们不同于顽固守旧的士大夫，也有别于洋务派官僚和买办。

譬如郑观应这个人，早年就放弃了读书赶考的道路，投入商界，为洋务派经办过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一类企业，是一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他自己说是“触景伤时，略陈利弊”，于一八六二年出版了《救时揭要》一书，一八七一年增删为《易言》，一八九三年又增订改名为《盛世危言》发行。因此，前后经过三十年才完成的《盛世危言》，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书，反映了甲午战争前改良主义思潮的全貌，也基本上概括了那个时期这批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在贫乏和饥荒的知识界中，还流行这部书。

他们在这一类书中，强调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中国不

能守着老样子不变,相信“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但只能由渐而变,一点一滴地变,不能变得太猛太急。他们相信事物是变的,这一点是对顽固派永恒不变思想的否定;但他们只看到点滴的量变,不承认事物的质变,这就又使自己滚进了对抗革命的泥坑。他们的主张:一、要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只有兼采西学,变法自强,才能改变被侵略的地位,因此揭露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但是他们以为只要“自强”起来,帝国主义就会停止侵略,就会从中国撤走,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二、要求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提倡“民间自立公司”,提倡“富人出其资,穷人出其力”的资本主义剥削,提出“商战”的口号,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三、把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划分为君主专制、民主共和、君民共主三种,认为君主专制君权太重,民主共和太偏激,只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政治)最“合适”。新起的资产阶级,满想通过这种药方来挽救民族危机,缓和阶级矛盾,从而改变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使自己成为当权的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这些软弱的表示,也就是后来戊戌变法所要努力实现的基本内容。

二、康有为最初的活动

作为维新变法运动主角的康有为，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酝酿的后期，就已开始活动。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他早年去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读了些介绍西学的书，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治国的办法，不能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因为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反过来看清朝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却是那样古老闭塞，老被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处境一天比一天坏。这样，康有为的革新思想产生了，他把学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真理。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当时正当中法战争后不久，不仅一些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邻邦，如越南、缅甸、锡金已被英、法侵占，而且英国又在发动侵略中国边疆西藏的战争，俄国在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后，进而窥伺中国东北等地区，日本也在向中国东北亲密邻邦朝鲜步步进逼。康有为看到这

般情景，写了封五千字的上皇帝书（第一书），去叩紫禁城的大门。书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已从侵占邻邦、伸入边疆，进而达到深入内地的危险局面；人民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到处是“骚乱”，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将会再次爆发。他认为在这个时候赶紧变法改良，还可以挽救危局，要是再迁延下去，就不堪设想了。这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议的开端。

这封上皇帝书，不过是一个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向地主阶级总头目——皇帝的出谋献策，表达了一点资产阶级的改良愿望而已。在顽固守旧的官僚们看来，一个毫无地位的书生，竟敢向皇帝大发议论，实在不象话，不愿把书送给皇帝。本来，康有为在这次乡试中，已被内定为考中的第三名。主考官顽固派徐桐，对康有为的上书很反感，大骂“如此狂生”，不予录取。康有为落选了，但是，他经过这次上书，却渐渐有了声名。

康有为见他的建议书没有送到皇帝那里，曾写下“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的诗句。就是说这次向皇帝上的“治安”建议，明知很难上达，是失败了，但他这个在野的知识分子并不因此灰心，还要加油干。他回到广东，招收学生讲学，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名叫“万木草堂”的学馆。他写了《长兴学记》，开始发挥他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先后来到这里学习。梁启超出身于地主家庭，这时已经是个年少的举人，却来拜还没有考上举人的康有为为师。梁启超渐渐放弃专搞科举考试的那一套，扩大学习领域，学习经学、理学、史学和西学，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成为

康有为的主要助手，被人们合称为康、梁。

万木草堂开始只有二十多个学生，一八九四年达到一百多人，是康有为培养助手、制造维新理论的场所。据说因为康有为反对八股文，学生受了他的影响，不愿参加科举考试。家长大不高兴，说不参加科举考试还读什么书？他们以不给学费来要挟自己的子弟。康有为转而力劝学生向八股文投降，说“我且考过，诸君何妨勉力为之，以慰父兄之心呢”！

康有为在广州的这几年中，一边教学，一边著作，为了使变法主张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得到共鸣，写了不少书，着力引伸和附会孔子的学说，作为变法理论的依据。其中有两部书在思想界产生过震动，对戊戌变法的影响最大，一部是一八九一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一部是一八九二年开始写起、几年后才完稿的《孔子改制考》。

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作“六经”。经就是经典的意思，相传都是经过孔子编订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到西汉末，因为发现了一批儒家经传，是用篆书一类的古文字写的，同那时用隶书写的通行的本子有所不同，从此产生了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康有为想引用经传，编造变法理论，来开展他的政治活动。他的《新学伪经考》就是要打倒古文经，树立今文经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使变法改良主张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找到依据。他多方论证，古文经是刘歆（音心 xīn）帮助王莽篡夺汉朝刘家的天下，而伪造出来的，所以他叫古文经为“新学”，是王莽的“新”朝之学，是刘歆捏造的伪经，不是孔子的真经。这样，他公然把

历代奉为神圣的孔子经书的一部分说成是假货，就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古代的经典，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动摇，在客观上也打击了死守“祖宗家法”的顽固势力。因此，这部书一再遭到清朝政府的禁毁。

《孔子改制考》，发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托古改制就是把自己设想要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行过，借以争取人们的信服。康有为认定孔子就是一个托古改制的大家，孔子著作的六经是托古改制的范本。康有为想用这些证明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合理的，是对孔子的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这些议论也和《新学伪经考》一样，遭到了顽固派的骇怪和反对。但是，《孔子改制考》的许多论证，确是极为荒谬的。譬如，六经本来是长期累积、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顶多经过孔子的整理删订，康有为却硬说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写出来的。这样一来，连包括大量民间歌谣的《诗》经这样一部古代诗歌作品选集，也都成了孔子个人的创作。为了把孔子神秘化，甚至用一些荒唐无稽之谈附会起来，说孔子是什么上天降精的黑帝（神），所以是“大圣人”、“大救世主”，而他康有为又是最能获得孔子真传和最崇敬孔子的一个人。

康有为又写了《大同书》。《大同书》也不是象有些人瞎吹的那样，是一部什么“不平凡的天才”著作，只不过是拾取有关思想资料，加上他自己的推想，拼凑成一个空想的“大同世界”图案。他认为人世间是个大苦海，贫贱人有苦，富贵人有苦，连帝王也有苦，要把这个大苦海，变为“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极乐世界。康有为害怕资产阶级革命的

“铁血之苦”，更害怕当时世界上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铁血之苦”，想乞灵于人的“本性”，发挥“不忍之心”，让人们互相携手，互相拥抱，来消灭革命的铁和血，走向“大同”，把被压迫阶级“同”到地主资产阶级的旗帜下去。这就是康有为梦想的“大同”。毛主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这条路不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虽然对冲击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实，他尽管把古文经书看作是伪造的，却仍旧把孔子的六经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他只是否定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成说，却引伸出孔子是为改革社会政治制作六经的“新”论。他仍然是依靠孔子这个“权威”来进行说教，想把孔子改造为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需要，拿孔子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爬上政治舞台的敲门砖罢了。

可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活动，一开始就是抱住两个最大的封建权威，一个是孔子的理论权威，一个是皇帝的政治权威。资产阶级一出场，就表明了它的软弱性、不彻底性，以及和封建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和皇帝，到十九世纪末年，本来已是两具封建僵尸，康有为却想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来改造这两具僵尸，然后借用他们的旗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结果是失败了。他后来保皇、复辟，连自己也变成了封建僵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被人们“永定为复辟的祖师”，决不是偶然的。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〇页。

三、走向政治改良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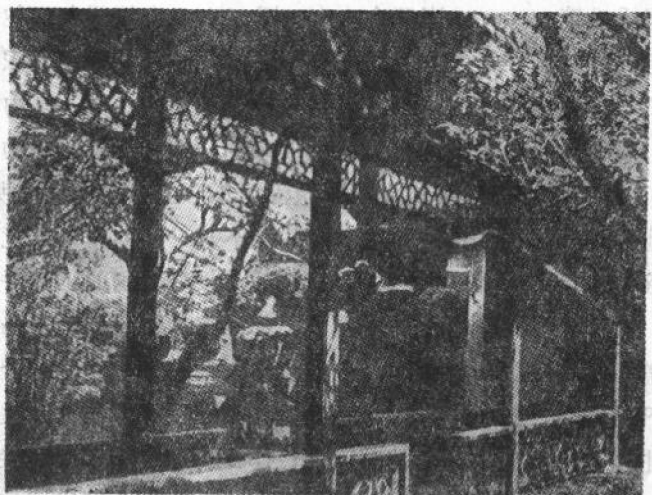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政府又一次惨败，无耻地向日本投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给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更大的侵害和震动。战争开始时，人们满以为搞了很久的北洋海军，对地狭人少、羽毛未丰的日本帝国主义，总可以抵挡一阵，却没有料到经黄海和威海卫两次战役，就全军覆没，陆军也节节溃败。洋务派官僚吹嘘的“富国强兵”，象泡沫一样破灭了。清朝政府的腐败，中国的积弱，暴露得更加彻底了。《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省等大片领土，赔款二万万两，日本资本家得在中国自由设置工厂等等，不仅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陷得更深，眼看沙俄、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将挟持不平等条约的“最惠国”待遇，进一步争夺特权，扩张各自在华的侵略势力，中国已面临被分割的危险局面。帝国主义分子公然叫喊：过几年再来看中国，就不复存在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酝酿了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开始转变为具有实际斗争意义的政治改良运动。

一八九五年春天，是清朝政府定期举行选拔进士的国家

考试——会试期间，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应试。康有为先一年考上了举人，取得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这时正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在北京参加会试。四月十七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探知条约的全部内容，大为震惊，立即要梁启超去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不要批准卖国的《马关条约》。湖南籍举人闻风而动，报名参加。二十二日，两省举人便联合到都察院（清朝政府监督、弹劾（音核hé）、建议的最高机关）上书，打了头阵，接着是福建、四川、江西、贵州等省举人上书，接着是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等省举人上书，又接着是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举人上书，台湾省举人更声泪俱下地上书反对割让台湾。几天里，都察院门前，车马盈巷，人群纷集，一时议论沸腾，激起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

康有为看到举人们爱国的激动情绪，大可以为变法活动造成声势，决定联合在北京的所有举人，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请愿，便连夜起草了一封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第二书）。书中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割弃台湾将失去全国民心，极力主张拒绝和议，明定对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一、皇帝赶快下罪己诏，大行赏罚，提拔善兵能战的军官，处分辱国和敌的大臣和不作战备的地方长官。二、迁都西安，免得在北京容易受敌人要挟，以利再战。三、加紧练兵，把对日本的二万万两赔款移作军费。四、发奋变法，推行富国、养民、教民即改进工业、农业、商业、货币和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在政治生活中，为了改变上下隔阻，下情不能上



松筠庵，公车上书开会的会址

达的状况，主张以府县为范围，约每十万户中，由士民公举一个有学识、有才能的“士”（知识分子）充当“议郎”。担任官职和没有担任官职的“士”，都可以被推举。这种“议郎”不仅供皇帝谏询，还可以对皇帝的诏书提出不同意见，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政令，都要由他们开会讨论。这就是要求清朝封建统治者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开放政权，让改良派的君子们有一个做官的机会。以上四项，前三项是权宜办法，第四项才是康有为认为的独立强国的根本大计。用他的话来说，叫做“变法成天下之治”。这种所谓的根本大计，不过是在不触动封建体制的基础上，采取若干资本主义措施罢了。

康有为完成了这封上皇帝的万言书后，各省举人便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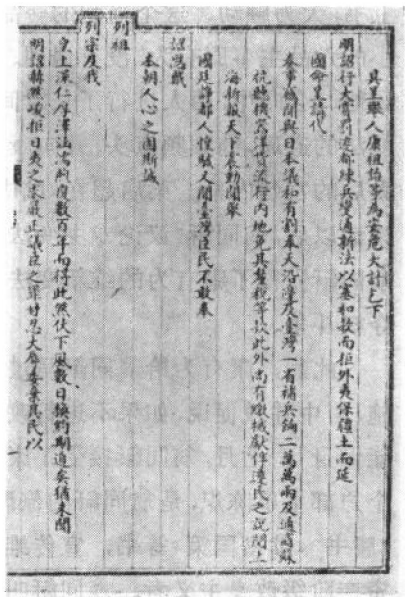
达智桥松筠(音云 yūn)庵开会,有一千二百多人签了名。他们决定五月二日一起去都察院,投递上皇帝的请愿书。投降派知道了,生怕妨碍条约的批准,多方进行破坏,一面在宫内活动,要西太后强迫光绪帝提前批准条约,造成无可改变的局面;一面进行威胁,军机大臣孙毓汶派爪牙到各举人的寓所,叫他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前途。有些经不起一吓的举人,竟要求除掉自己的签名。虽然如此,在反对投降卖国的正义呼声下,大家还是把请愿书送了上去。都察院推说皇帝已在条约上盖印,无可挽回。但举人们的上书大请愿,毕竟是一个不平凡的举动,使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激起了一阵波浪。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当时上海就出版了《公车上书记》,宣传这件事。

公车上书的参加者都是举人,举人是有了点功名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进入士大夫阶层的行列了。但是他们还在应试,还不属于当权派,很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有的在接受资产阶级的西学,要求进步。因此,公车上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的群众性爱国行动。社会阶层虽然狭窄,但联系面广,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

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的榜发出来了,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为工部主事,但没有到工部就职。五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又写成一封长达一万三千字的上皇帝书(第三书),内容与公车上书大致相同,只是删去了拒和、迁都的建议,把要

求变法的内容加强了,从各方面说明必须赶快变法的道理。这封上皇帝书,仍是投送都察院。这次,都察院迫于当时的议论,把它递给了光绪帝。光绪帝读了,觉察到所述变法要求,正是巩固清朝统治、提高自己权势的途径,对它马上重视起来,命令誊抄四份:一份呈西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总督、巡抚、将军审议,一份存乾清宫皇帝文件柜,一份存勤政殿,以备随时展阅。

康有为紧接着在六月间再次写了封上皇帝书(第四书)。在这封上皇帝书中,他不再转弯抹角地借用汉代那个“议郎”的名称,而是从正面论证设立议院的必要性。认为当前应尽先做好几件事:一、下诏鼓励臣民踊跃陈述政见;二、邀请有识之士讨论国家大事;三、设立顾问馆供皇帝谘询;四、设立报馆互通声气;五、设置专门机关吸引贤才到政府任职。这些无非都是为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制造气氛和准备条件。但是都察院不愿再给康有为递送上皇帝书,推说他是工部主事,照例应由工部代递。康有



康有为奏议

为就去找工部尚书孙家鼐（音耐 nài），孙答应了，不料工部的第二把手、侍郎李文田持反对态度，不肯画押（签字）。康有为又想通过兵部转呈，兵部尚书荣禄是西太后的心腹，更不肯代递，因此这次上书被阻搁。

这时，康有为却得到了另一条门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音和 hé），是户部尚书，并任军机大臣，居于很重要的地位。本来他是一个毫无改革要求的大官僚，在中国被日本战败后，眼看清朝的统治朝不保夕，在西太后的牵制下，又不能有所作为，很想为光绪帝，也为自己，寻找支持力量。他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触动。这个当朝的一品大员，便降低身分去访问小小的六品主事康有为，没有遇到。康有为受宠若惊，马上回拜了他。会晤中，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康有为详述了维新变法的道理，翁频频点头，并向康有为透露了光绪帝受制于西太后的宫廷内幕。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自翁、康谈话以后，翁同龢“议论专主变法，比前若两人焉”。那是因为，翁同龢懂得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大有利于对西太后的夺权斗争。

此后，康有为给翁同龢写过多次信，陈述变法的具体措施，信中并敦促说，如果不进行改革，那就“上不能保国，下不能保身”。七月，翁同龢接受了康有为的大部分建议。那时有个户部主事陈炽，是翁同龢的僚属，此人在甲午战争前就写过《庸书》《续富国策》等书，宣传维新变法，可算是一个老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翁同龢叫他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准备请皇帝陆续颁行。老于世故的翁同龢，怕因此触怒西太

后，想怂恿在皇族中有很高地位的恭亲王奕訢（音心 xīn）出来挡风，请他向皇帝面陈。这个曾经主持洋务活动的恭亲王，却断然予以拒绝，翁同龢就更不敢再去进行这桩冒风险的事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关于帝党和后党的问题：

西太后是咸丰帝的妃子。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奔热河，次年病死在那里，同治帝年幼即位。同治帝是西太后的亲生儿子，儿子做了皇帝，她得以升为太后，“垂帘听政”。封建王朝因故由太后或皇后主持政务，接见大臣时，要用帘子遮隔，表示男女有别，叫做“垂帘听政”。一八七五年初，同治帝短命死去，按照清朝皇室的家法来说，应该为同治帝立嗣，继承帝位。可是西太后偏偏不这样做，因为如果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的皇后就成了太后，西太后就要退居于无权的地位。所以她立同治帝的堂弟弟、一个四岁小孩为帝，即光绪帝。这样，她就仍然是皇太后，仍然可以“垂帘听政”，掌握大权。

一八八六年，光绪帝十六岁，开始处理朝政，但须报告西太后取得同意，西太后就由“听政”变为“训政”。到一八八九年，光绪帝成年了，已不便再“训”下去，五十五岁的西太后，只得归政给光绪帝，自己退居于花费了数千万两银子扩建的颐和园（音宜 yí）和园。但她不愿“颐和”，身在颐和园，心在紫禁城，仍然揽权。因此，在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争斗中，皇帝和太后的周围，形成了帝党和后党两股官僚势力。朝中和地方的顽固大臣多属后党，帝党只有翁同龢、文廷式等没有掌握实权的少数官僚。

甲午战争中，后党主和，帝党主战。帝党想侥幸取胜以挫败后党的气焰，结果这种“战”破了产。虽然如此，他们对公车上书的“拒和”主张，毕竟有点引为同调。因而，康有为在要求通过皇帝进行变法的频繁活动中，就把帝党作为靠山；而帝党也看出变法是取胜后党的一着棋，有意运用改良派这份力量。这就是帝党同改良派日益接近、互相呼应的内在关系，但帝党同后党的矛盾，也因此剧烈起来。

四、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

公车上书给维新变法造成了气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成政治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想从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得到支持，从中积蓄力量，就有一个迫切的任务，必须打开他们的眼界，给他们灌输维新变法的思想。因此，康有为继上书皇帝的活动之后，就着手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尽最大可能去做的事。

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为自己凑钱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因与广学会办的报纸同名，遭到教会势力反对，于十二月改名《中外纪闻》出刊。由梁启超、麦孟华编写文稿，除转载清朝政府的章奏和在华外国人报刊上的文章外，有论说一篇。每期印一千份，托送《邸(音底 di)报》(清朝政府的官报，专载诏书、章奏一类东西)的人，送给北京的官员们看，不收报费。一个月后印至三千份，可见人们还是欢迎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第一个报刊。最初，守旧官僚们不明《中外纪闻》的来历，有人揣测出自总理衙门，也有人以为出自外国公使馆，等到他们知道来自南海馆(康有为在北京的寓所)，便大为惊讶。

随着是组织学会，这是用学会的名义进行政治改良活动

的组织形式。经过康有为奔走联络，八月由帝党文廷式出面，邀同陈炽等人组成了强学会，推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钻了进来。康有为作《强学会序》，陈述了在列强侵略下的危迫形势，和成立学会挽救时局的目的。强学会隔几天集会一次，每次有人讲演；向上海购得译书几十种，计划设立图书馆；帝党翁同龢、孙家鼐出面支持，大官僚张之洞、刘坤一等，想标榜助新，也捐了款；李鸿章更想纳银二千两，申请入会，会中以李鸿章卖国，拒绝接受。李鸿章想入会，固然是投机、观风色，但也反映了这个运动刚兴起时的力量和作用。

强学会憎恨李鸿章的卖国，却识不破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利用。

那时后党和李鸿章投靠沙俄，沙俄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增长了。强学会一出现，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就很感“兴趣”，满想抓着这个机会，对帝党和维新人士施加影响，使强学会适合于他们的需要，同沙俄对抗。英、美驻中国公使馆，立即表示愿意捐助强学会图书仪器，英国公使欧格纳还力劝翁同龢，赶快着手“变法”。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分别从上海和山东赶到北京，多方活动，打入强学会。他们举行宴会，招待帝党官僚和维新人士，在宴会上发表赞同中国“改革”的“热情”演说，骗取好感。李提摩太又遍访北京的大官，向翁同龢提出名叫《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想通过翁转达给光绪帝，把他的意见变为施政纲领。意见书中说了一通“教民、养民、安民、新民”的漂亮话，把自己打扮成活象一个外国的

“康有为”。但是假的就是假的，真相总是要暴露出来的，他在意见书“中国目下应办之事”一段中，公然提出要清朝政府“延聘深可信任之二西人，合筹良法”。这“二西人”中，就有他自己的影子在内。并建议设立“新政部”，作为推行“新政”的领导机关，“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英、美人”。李提摩太心目中的四个英、美人，就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帝国主义分子赫德，英帝国主义汇丰银行大班艾迪斯，曾任美国国务卿、签订《马关条约》时充当李鸿章顾问的科士达，天津海关税务司、美帝国主义分子杜维德（又译作鲁德）。还建议设立“国家日报”，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总管。李佳白也赶紧写出名叫《新命论》的文章，要清朝政府聘用“西国大有声名、中外推服之人”。这个“西国”，当然就是英、美帝国主义。据李提摩太说，是因为英、美两国人士“皆无贪心”，“皆不好战”，最宜于帮助中国！按照他的逻辑，武装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干涉中国的内政，破坏中国的革命等等，都不算是贪心，不算是好战，而是帮助了中国，中国应向他们全部开放政权。李提摩太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一唱一和地兜售他们血腥的殖民政策。

他们的建议虽然没有得逞，但加深了帝党官僚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赖，也助长了维新人士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翁同龢曾经专程去拜访李提摩太，恭维他是一位“豪杰”；康有为则去找李提摩太商讨“合作”问题；梁启超还充当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

强学会在北京活动的影响一天比一天扩大，顽固守旧官僚不能容忍了，到处散布不利于强学会的流言蜚语。以致《中外纪闻》送出去，得到的回答是“怒目相向”，连付给高报酬，也没人肯代送了。他们还声称要奏请西太后严惩康有为。康有为呆不下去了，只好离京暂避，叫梁启超负责北京的工作。

十一月，康有为南下到上海，为了取得张之洞的支持，特地去南京拜会了这位以“通达时务”自居的两江总督。张之洞表示赞同在上海设立强学会，答应提供开办经费。康有为返回上海，制订了上海强学会章程，标明宗旨是研究各国强盛弱亡的缘故，以讲求中国如何自强的学问，规定四项任务：一、译印图书，二、出版报刊，三、设立图书馆，四、开办博物院。随即发刊《强学报》，每日印一小册，同《中外纪闻》一样不取报费。那时的所谓东南名士黄遵宪、张謇（音剪 jiǎn）等都入了会。黄遵宪，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在这以前，担任过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和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写了《日本国志》一书，赞同维新变法，是中国近代的著名诗人。他的《人境庐诗草》，反映了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张謇，江苏南通人，光绪时状元，是经营纺织、面粉业的大资本家。他这时赞同变法，后来成为著名的立宪派头目。

北京和上海强学会的会员，共有五十人左右，大致包括这几种人：一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分子，二是帝党官僚，三是依附洋务派的官员或所谓名士，四是居于赞助地位的大官僚，甚至还有帝国主义分子。在北京，可以说主要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同帝党翁同龢、文廷式等官僚的合作；在

上海，则主要是以康有为、黄遵宪等，同张之洞系的洋务派官员的合作。但起核心作用的，仍是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

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变法的呼声高起来了。顽固派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严重威胁，公开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决心扑灭强学会这个组织。一八九六年一月，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上了一个奏章，攻击强学会结党营私，攻击《中外纪闻》贩卖西学。西太后便借此勒令光绪帝封闭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狡猾的张之洞得到消息，便借口不同意宣传“孔子改制”，不同意用孔子降生纪年为理由，停止供给上海强学会经费，并用两江总督的大权，下令查禁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那些见风转舵的官僚，也就纷纷宣布退出强学会。

不久，有个御史奏请设立书局，翁同龢乘机主张恢复强学会。结果将查抄强学会的图书仪器发出，在北京设立官书局，选译外国书籍和报刊文章，这个官书局日后併归京师大学堂。

上海强学会被查禁后，黄遵宪、汪康年等提议，以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来上海任总编辑。一八九六年八月，《时务报》创刊，刊载论说、上谕、奏折、京外近事、海外报译等内容。梁启超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鼓吹改良的论文，吸收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论证维新变法的必然趋势。他说：“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音岸 àn）；新则洁，旧则败”，驳斥了顽固派墨守祖宗成法的反动思想。他的文笔新颖流畅，知识分子比较爱看，几个月里《时务报》销数增加到一万多份，是维新变法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报刊。但是，梁

启超也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害怕人民群众的起义斗争，说“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要赶快变法来加以防止。这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动本质决定的。

当强学会被迫解散时，康有为回到广州，仍在万木草堂讲学，一度去香港、澳门活动。一八九七年二月，他在澳门与一个侨商创办《知新报》，由他的弟弟康广仁和学生徐勤主编，成为中国南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刊。随即又去桂林讲学，在那里发起组织“圣学会”。康有为总是念念不忘孔子的“圣教”，到处把它作为大旗挥舞。

当北京、上海的维新变法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湖南也开始动起来了，并且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最为活跃的省区。这是同谭嗣同等人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在新疆巡抚衙门里办过事，后来游历各省，足迹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对社会接触较广。他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极为愤慨，说是把四万万人的身家性命都断送了，思想从此发生变化，在家乡同好友唐才常筹办革新事业。一八九五年秋天，他又专程去北京拜访康有为，恰好康有为离开了北京，没有碰上，只同梁启超见了面。梁启超向他介绍康有为的思想主张，他大为佩服，愿作康有为的“私淑弟子”（没有直接受教的学生）。强学会被封闭，他很惋惜，幻想争取汉口英国领事的支持，组织湖南强学会分会。

一八九六年七月起，谭嗣同在南京任候补知府的闲职，他用功钻研中西学问，写成哲学著作《仁学》。有些人称赞它是一

本思想锐利、富有战斗性的书。这本书实际上是儒家、墨子、老庄、佛学和西学的杂揉，书中虽然偶有些带唯物论色彩的话，而渲染得更多的却是先验论和神秘主义。他拿物理学上“以太”一词，作为他的哲学术语，说万物都有知觉，都有灵魂，这种知觉和灵魂就是“以太”。那末，“以太”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物质和精神的混合体，这就抹煞了物质和精神的界线，抹煞了精神依赖物质的关系，完全将物质、生理、社会等现象等同起来，是一种把人引入迷宫的神秘哲学。

但另一方面，书中也尖锐地抨击贵古贱今的错误思想，激烈地控诉封建伦常的滔天罪恶，声言要“冲决网罗”，就是说同一切封建束缚决裂。这是具有民主思想的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过积极作用。不过他自己并没有从“网罗”中挣扎出来，而是站在“网罗”中冲决“网罗”。他反对封建伦理，却不敢同孔子真正决裂，他咒骂君主专制，却为拥护光绪帝变法卖力。这个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即使是表现得慷慨激昂的左翼如谭嗣同这样的人，也逃不出被织成蛛网一样的封建势力的束缚。而谭嗣同偏偏要把康有为捧作“一佛出世”的救世主，把自己打扮成“冲决网罗”、革新社会的“先知”，这又完全是在散布“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

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音针 zhēn)，是总督、巡抚中唯一倾向变法的湖南大官，调到湖南任按察使(掌握一省刑法的官)的黄遵宪和学政(掌握一省文教的官)江标及后任徐仁铸，都赞同变法。一八九七年秋天，陈宝箴又邀请谭嗣同回湖南，梁启超也应约来湖南。于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能够发挥能量的

学堂、学会和报刊，都在湖南举办起来了。

一八九七年十月，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担任“中学”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担任分教习，还有“西学”总教习。梁启超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设经学、子学、史学、西学等课程，是从旧式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过渡形式，也是作为科举、八股的对立物产生的。梁启超在批改作业和讲课中，发挥了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争权的所谓“民权”思想，遭到顽固派岳麓书院山长（院长）王先谦和大劣绅叶德辉等攻击，说他宣传不要父母、不要君上的邪教，要把他驱逐出境。梁启超不能坚持，不久就离开湖南到上海去。

在谭嗣同、唐才常的积极策划下，一八九八年一月南学会成立。南学会是强学会的继续和发展，规定由地方有威信的士绅十人担任会长，再由这十人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朋友的介绍，吸收会友，每州每县须有三到十人。总会设在长沙，各府厅州县设分会。讲论是会中的主要活动，每月四次，由黄遵宪等主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内容，凭单（票）听讲。据主讲人之一皮锡瑞的日记中说，索取听单的人很踊跃，有时开讲，“人尚来而坐已满矣”。这种情况，反映了那时的知识分子，很想从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也反映了他们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找到一条救国的道路。

顽固派害怕这种风气蔓延滋长，王先谦又跳了出来，要求陈宝箴奏请清朝政府处死康有为，并指使喽啰大起哄，攻击南学会的讲学是宣传“邪说”，散布“淫词”。叶德辉也紧跟上来，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時務報

第一冊



強學報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此報之宗旨在開通民智... 凡我同胞... 宜共勉之...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

知新報

每冊取費一元... 本館在澳門大井頭第四號



新學報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報第一

当时出版的一部分报刊

对徐仁铸介绍新学书籍的《轺轩(音尤宣 yāoxuān)今语》，肆意歪曲，逐条反驳。他们逼迫皮锡瑞离开湖南。顽固派还不罢休，进而宣称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樊锥(音凡追 fánzhuī)的罪状，是“背叛圣教”、“惑世诬民”，然后他们齐集学宫大成殿(供奉孔子牌位的殿宇)，祷告孔子，把樊锥驱逐出境。

报刊方面，先是学政江标已在长沙创刊《湘学报》(一度改名为《湘学新报》)，倾向维新。一八九八年三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创办《湘报》(旬刊)，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刊载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论文，主张“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认为只要“利之所在，听民自兴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就可以使旧法逐渐解体，新政逐渐推行。张之洞对这种不痛不痒的议论，也惊怪是煽动人心、犯上作乱的文字，写信要陈宝箴加以约束。陈宝箴答应以后删去报首议论，张之洞才罢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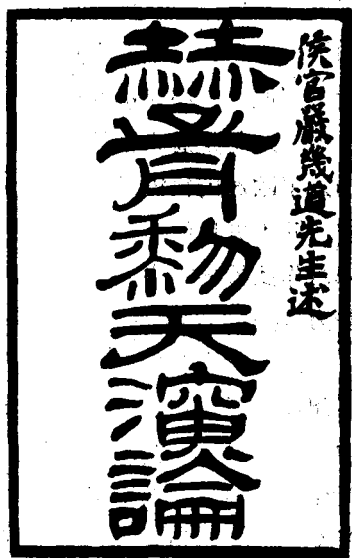
在天津，一八九七年十月，严复、夏曾佑等举办了《国闻报》。《国闻报》是日报，每日出版八开报纸一张，登载国内外时事，经常发表社论。稿件来源，除了大量选译外国报刊外，还派员到各地采访，国外也设有访员(记者)，是当时比较完备的报纸。还另编一种旬刊，叫《国闻汇编》，把报上的重要议论收入汇编。它的目的是要求中国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力求自强，对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有较大影响。

严复，福建侯官人，少年时进入洋务派举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一八六七年被派往英国学海军，留心西方文物制度。回国后担任天津水师学堂监督(校长)，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刺激，在《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章，鼓吹

变法，主张废除八股文，改变专制制度。并努力译述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一八九五年译述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即《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但附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见解，后来在《国闻报》陆续发表，至一八九八年才正式出版。自鸦片战争以来，较认真地译介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著作的，这是第一部书。它以进化论的观点，否定了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

赫胥黎是十九世纪英国的自然科学家，著名的进化论者达尔文的朋友，他的《天演论》是宣传达尔文学说的。总的说来，前半部着重解释自然现象，是唯物的；后半部着重解释社会现象（伦理过程），是唯心的。书中的基本论点，阐明生物界的进化是由于“物竞”和“天择”。“物竞”是说生物都是互相竞争的，在竞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天择”。他认为这个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说社会中的人，“正如其他动物那样，繁殖不断地进行，并为寻求生存资料而进行激烈的斗争。生存斗争，使那些比较不能使自己适应于他们生存环境的人趋于灭亡，最强者和自我求



《天演论》译本的封面

生力量最强者，趋于蹂躏弱者”。完全把人类社会和生物界等同起来，注定强者要蹂躏弱者，弱者只能被强者践踏，这就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弱小民族提供了论据，是十足的反动理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这个历史规律，已经彻底粉碎了这种反动的庸俗进化论观点。但在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地要瓜分中国的形势下，把这种观点介绍到中国来，却促使人们憬悟到中华民族如果再不振作，就会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沉没。因此，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纷纷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变法自强。这却是赫胥黎始料所不及的。毛主席指出：“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①十九世纪末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把这些东西拿来当作武器的。事实上，这种武器根本不能战胜顽抗的封建势力，斗不上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重要步骤，起了组织力量和制造舆论的作用。据《戊戌政变记》所载，三年内，全国设立学会、学堂、报馆等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二十四，学堂十八，报馆七，书局二。实际远不止这个数目，经过统计，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三百所，主要分布于江苏、湖南、直隶、广东等省，表明资产阶级这时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薄薄的社会基础。但当时参加学会、学堂和阅读报刊的人，仅是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全国四万万万人中的极少数。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六页。

五、死抱住一个皇帝

改良派眼睛里只看到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根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以为通过皇帝下诏书，发动变法，就可以达到“救国”和参政两个目的。这是康有为等倡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基本途径。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是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和九龙。中国已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紧急关头。康有为又从广州赶到北京，进一步向他的“皇上”上书。

这次，和一八八八年那次上书大不相同，和公车上书时也不相同。这时，好些地方已经建立学会、学堂和报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已有了些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而光绪帝和帝党迫于国内国外的形势，和恢复皇帝权势的要求，接受变法主张，把它付之实施的决心也增加了。

十二月，康有为赶写了又一封上皇帝书（第五书），书中的措词比以往的历次上书都更慷慨激昂。他沉重地指出当时的形势说：日本议院天天在开会，各国的报纸议论纷纷，都是在讨论瓜分中国的事，“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国际形势是这样，国内情况又怎样呢？他说自从割

了台湾后，全国皆知朝廷不可靠，“人无固志，奸宄（音轨 quǎn）生心”，到处埋伏着人民反抗政府的危机，即使没有外国的逼迫，已经是够值得忧虑的了。现在已是内外交困、山穷水尽的时候，如果还不动手变法，赶快想办法挽救，到那时想求一个半壁河山的偏安局面，“皇上”和诸大臣想当老百姓，也不可得了。这种话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不堪设想的，而康有为正是想用这种不怕杀头的话，来激动光绪帝，以表示他的耿耿忠心。

怎样改变这个危险的局面？康有为提出了三个对策：

以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为榜样，亲定国家大政方针，宣布变法。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上很接近，两国的政俗也大同小异，如果效法日本，不但易于着手，也易于取得成效。这是上策。

召集有才能的官员，谋划变法，逐日分批召见这些官员，商讨变法的具体方案和步骤，权衡轻重缓急，依次推行。这是中策。

督促各省大臣，各就本省实行新政，各省总督、巡抚在三年内对新政要办出成绩来，如仍敷衍应付，就把他们撤职。这是下策。

以上三策，他请光绪帝选择一个加以实行，说是能行上策，就可以强国；能行中策，可保弱国地位；能行下策，仅免于亡国。康有为当然希望他的“皇上”能行上策，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移植为中国的“光绪维新”，他自己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伊藤博文”（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

康有为把这封上皇帝书送到工部，请转呈光绪帝。那时

的工部尚书淞淮，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满洲贵族，看了大为恼火，不肯代递。这封大胆的上皇帝书，虽然没有送到光绪帝手里，但是许多官员转相传抄，天津、上海的报纸也把它刊载出来，一时流传甚广，为一些士大夫所欣赏。都察院的给事中（谏官）高燮（音谢 xiè）曾看到后，想借此攀附新兴力量，从中捞一把，当即上了一个推荐康有为的奏章，请光绪帝立刻召见康有为，给以重任。翁同龢趁势在光绪帝面前夸奖康有为。光绪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顽固守旧大臣从中拦阻，恭亲王奕訢向光绪帝说：“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皇上若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没有勇气打破成例的光绪帝，只好依照奕訢的意见，改令大臣传康有为“问话”。

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的西花厅。出席问话的大臣有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等五人。这次问话是变法和反变法的一场小小辩论会。荣禄首先开口，他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答：“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领土的，今天祖宗的领土也保管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比如这个总理衙门，就不是“祖宗之法”规定的。接着，廖寿恒问：变法从什么地方下手？康答：应从改变法律、制度开始。李鸿章听了不耐烦，便以质问的口气说：难道六部都可以裁撤，规章制度都可以不要吗？康答：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再是从前关起门来做皇帝的局面了。现行的法律和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中国危亡的，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康有为唯恐说得过重了，又退一步说：即使不能尽废，也应斟酌情形加以改变，新

政才能推行。翁同龢岔开他们的辩驳，转问变法需要的款项怎样筹措？康答：日本设立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成效都很可观。中国地广人众，只要改变制度，税收将比现在增加十倍。接下来，康有为详谈了他所设想的具体方案。

第二天，翁同龢把问话的情形告诉了光绪帝，再一次保荐康有为。光绪帝又要召见康有为，奕訢再次拦阻，说不妨先叫他提出书面意见，如确有可行的办法，再召见也不迟。光绪帝又只好将原定的亲自问答，改为书面建议，并要康有为将他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等书送上去。这一次康有为接近了光绪帝一步。光绪帝命令以后对康有为的奏章、条陈，应该随到随送，不得任意阻挠和积压。

一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上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书）。这时康有为是“应诏”（遵皇帝之命），而不是自说自话上书了。他在这篇奏书中，概述当时世界上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没有不沦于被分割和危亡的悲惨命运。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各国的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之所以面临危亡，就是由于保守旧法不知变革。现在只有毅然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此外没有别的路好走。

他说明治维新时，头绪虽多，但最基本的是三条：皇帝和大臣一起宣誓变法，设立专门机构延揽贤才参加政治，设立制度局制订新法、新制。以此为依据，他请求光绪帝尽快做好三件事：

一、召集群臣于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宣誓变法，大臣们都要表决心，革除旧习，努力维新，否则自请免官；

二、设上书所于午门，让士民自由上书，官员上书建议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手中，无须代递，有合要求的，就要破格任用；

三、设制度局于宫廷，选拔通才数十人主持，皇帝每日到局议政，哪些应新增，哪些应修改，哪些要保留，哪些要废除，都要订立章程，颁布施行。

康有为进而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议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体制，来衡量清朝政府的政制，认为多不合理，难于推行新政，所以要设立制度局，作为策划和实施新政的领导机关。在制度局之下，分设法律、度支(财政)、教育、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游会(管政会、学会、教会、游历等事)、陆军、海军十二个局。地方每道设一民政局，选拔通才主办地方新政，准许专折直陈皇帝，地位和总督、巡抚相等；每县设民政分局，负责兴办地方的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等事。他还建议送人出国游学，大译外国书籍，改变科举，设立各种学堂，兴办银行，训练军队，等等。

这个“统筹全局”的奏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新政治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

光绪帝看了这道奏折，就把它发给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会议。看来这个想从西太后掌握中挣扎出来的皇帝，已经决心一试了。

随同“统筹全局”奏折，康有为把《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书

也送了上去。他在这本书的序文中说：欧美大约经过三百年造成了它们的体制，日本学习欧美，花了三十年而模仿成功。如果以中国地广人多的基础，就近学习日本，三年就可初具规模，五年就可纳入轨道，八年就可大见成效，十年就能成为称雄世界的强国。康有为这些改良派君子们想得多么美妙，好象只要一学日本就灵，顽固派都会乖乖地驯服，帝国主义就会吓跑了。隔了几天，康有为又使出他的上书本领，写出上皇帝的第七书。书中着重称述俄国彼得大帝放下尊贵的皇帝身份，到外国游历学习，取得经验，然后回到国内进行改革，是皇帝勇敢学习他国的好榜样。康有为要光绪帝学习的外国，并不是俄国，而是日本，只是要光绪帝拿出彼得大帝的勇气来学习日本。

毛主席指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思想认识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①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这样的一批中国人。他们学习西方，更多地是想通过向日本学习来实现，因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取得了成效，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日本又是个君主立宪国家，有一个天皇，正合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拥护一个皇帝的胃口。所以在他们看来，向西方学习，日本恰是一个现成的样板。

康有为从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皇帝书，到一八九八年光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五九页。

绪帝宣布变法前夕，十年间，一共上了七次书，反复陈述维新变法主张，他自己在一首诗中说是“忧时七上皇帝书”。但其中起作用最大，使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要求逐步变为光绪帝的主张的，是他的第五书和“统筹全局”的第六书。光绪帝在得到“统筹全局”的奏折和《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书后，把它们放在写字台上，经常阅览，并开始零星地下达新政诏书，表明变法已提上了光绪帝的议事日程。

资产阶级改良派依靠皇帝、实行变法的“救国”愿望，就是想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瓜分威胁中解救出来，变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主的中国。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的严重任务。然而他们是怎样认识和对待帝国主义的呢？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公开的武装侵略，却不认识帝国主义隐蔽的和平进攻；他们看得出这一些帝国主义的张牙舞爪，却识不出另一些帝国主义的口蜜腹剑；他们要学习西方、学习日本，却又把学习当作了依靠。这样，他们就给自己的“救国”宣言，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日本参谋本部派间谍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到武汉活动，想通过张之洞劝告清朝政府，联络日本的同盟——英国，以抗德国。那时刚在甲午战争后，清朝的大臣们对日本不太信任，起决策作用的恭亲王奕訢，又是个联俄派，没有接受日本的这种劝告。康有为知道了，却以为英、日可用，特地去找翁同龢，要翁接受日本的劝告，替御史杨深秀写了一道请联英、日的奏折，又替另一个御史写了请联英、日的奏折，自己还写了一篇《联英日策》，送人传阅。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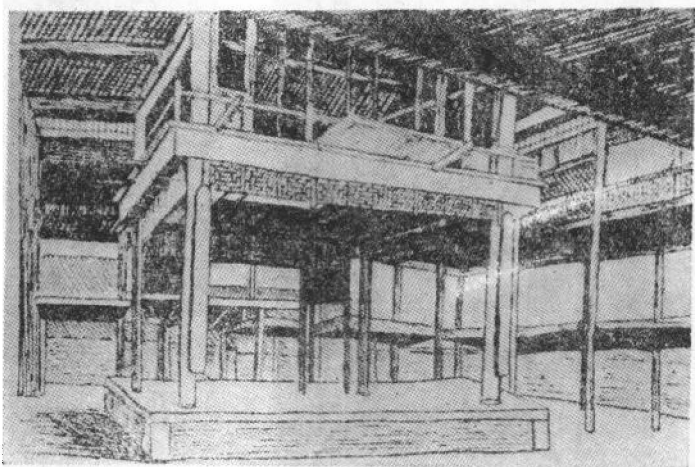
甚至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乞求延期偿付尚未付给的对日赔款，以便将这笔款子移作变法经费。矢野文雄装出一副可以商量的姿态，想借此扩大日本的影响，煽动康有为鼓吹中、日两国召开“合邦大会议”。恰好这时沙俄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的侵略要求，逼迫清朝政府签订“租借”条约。翁同龢等帝党官僚极力反对，主张联英拒俄，而一意投靠沙俄的奕訢、李鸿章，则力主签约。两派官僚各投一方，互相扯皮。光绪帝在翁同龢、康有为的主谋下，责问奕訢、李鸿章，说：“你们说俄国可靠，与它签订密约（指“中俄密约”），给以大利，现约期还没有到一半，不但不能阻止别国来瓜分中国，俄国反而自己背信弃义来索取土地，密约又有什么用！”但西太后早已投向沙俄，极力支持奕訢、李鸿章，终于同沙俄签订了出卖旅顺、大连的“租借”条约。

英、日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帝党和维新派，同沙俄争夺对清朝政府的控制权，毫不放松，它们一再向帝党、维新派以及地方实力派施加影响。一八九八年初，英国议员贝士福来华“游历”，先在北京活动，多次诱使翁同龢商谈中、英“合作”，又南至武汉、南京，向张之洞、刘坤一兜售“联英”路线。这时，日本参谋本部派来的间谍，又一次在武汉出现，找到谭嗣同游说中、日联盟。这种诱惑，更加引起了维新派君子们的极大幻想。唐才常在《湘学新报》上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的文章，说什么和英、日结成同盟，就可以对抗其他国家的侵略。康广仁也在《知新报》上发表以《联英策》为题的文章，说什么英国是“救人之国”。

自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间，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大致分为俄、法和英、日两大势力。资产阶级改良派联络英、日的路线，对国外是想仰仗英、日以抵制沙俄；对国内以为有了英、日的支持，就可以打击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后党顽固势力，取得能够顺利进行变法的保障。后一点是主要的，因为抵制沙俄也是为了打击沙俄扶植下的后党势力，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力量和信心。他们抱住一个皇帝，这个皇帝没有实权，还得依靠半殖民地的太上皇——帝国主义，来帮助这个皇帝变法。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光绪帝和帝党官僚采取投靠英、日的路线，以对抗西太后和后党执行的投靠沙俄的路线，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卖国主义路线。

六、围绕着保国会的斗争

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间，康有为在北京的活动，是一八九五年公车上书时在北京活动的继续。这时，康有为等除抓紧向皇帝上书外，还倡设学会。最先，广东籍旅京人士发起开粤学会，跟着杨锐等发起开蜀学会，林旭等发起开闽学会，杨深秀等发起开关学会。这是通过各省在北京人士的活



保国会第一次大会会址

动来扩大影响，把维新变法运动，由北京推广到各省。

一八九八年春天，北京又要举行会试了。康有为想再次把举人们吸引到维新变法的道路上来，准备邀约举人们同主张或倾向维新的官员，一起开一次大会，向顽固派造成有力的攻势，推动变法。恰好御史李盛铎有钻进来标榜维新的意思，便联名组织发起保国会。四月十二日，保国会在粤东馆开第一次大会，有两三百人到会。康有为写了《保国会序》，在会上发表演说，追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败再败的历史，并分析了失败的原因。特别指出，从德国强占胶州湾起，仅两个月中，丧权失地的事就发生了二十起，这样下去，还能保持多久？他还拿日本和中国作对比，说日本本来也受外国欺侮，是个弱国，因为有的人出来痛哭，有的人出来发动“尊王攘夷”（尊事天皇，抵御外国），有的人出来大叫大嚷要变法，大家振奋起来，所以一变而为强国。他在这里抹煞了当时日本激烈的群众斗争对历史的推动，只看到少数“志士仁人”的活动，完全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不要群众、看不见群众力量的反动唯心史观。

保国会的名称标示了它的宗旨，是要保清朝政府统治的中国。为什么要保？因为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有被灭亡的危险。会上通过了康有为起草的“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一、国土一天天被侵占，主权一天天被剥夺，国民的生计一天比一天困苦，总得想个法子拯救，所以要开会共谋保全；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政权、土地不丧失，保民族种类能自立，还要保他们当作民族精神象征的“圣（孔）教”；三、讲求变法，讲求内政外交，讲求经济实效，以协

助政府进行治理。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还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领导关系、入会手续、会员权利，等等。可以看出，从强学会发展而来的保国会，是一个初具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但它只是想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许可之下，进行一些政治的经济的改革，以达到“保”的目的。列宁说：“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①保国会标出的宗旨，只能是向封建统治阶级乞讨的革新。

保国会在第一次大会之后，四月十五日在崧云草堂召开第二次大会，梁启超到会演讲，驳斥了当时在士大夫中流行的中国已无可作为的悲观思想；十九日又在贵州会馆召开第三次大会，到会仍在百人以上。这时保滇（音颠 diān）会、保浙会、保川会等，也相继在北京组成，康有为都到这些会去作了演讲。梁启超说，在那个“强盗入室，大火烧门”的亡国威胁中，在北京召开的保国会，是“壮者荷戈持铎，大声疾呼”的行动。虽是自吹自擂，却也反映了一定的情况。经过保国会的推动，维新变法的波浪确在士大夫中较大程度地激荡起来，在一部分人中已造成了非变法不可的舆论。

尽管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在不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前提下，要求作点革新，可是顽固派对这种有限的维新，也看不顺眼。哪里有维新活动，哪里就遭到他们反对、破坏。从一八八八年以来，顽固派禁止传播西学，焚毁新书，查禁报纸，封闭强

^① 《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一五七页。

学会，哄散南学会，驱逐维新人士等等，都是顽固保守势力对维新力量的抑制和打击。

从强学会、南学会发展到保国会，已由地区性的立会，进而成为全国性的具有政党规模的统一组织，影响愈来愈大。因此，顽固派对保国会也就更为仇视了。

一个叫洪嘉与的吏部主事，代表一切守旧官僚的心理，唆使正在北京找门路的无聊文人孙灏（音号 hào）写了一篇题为《驳保国会》的文章，说康有为“目无君上”，想做“民主教皇”，并把它印成小册子，遍送北京的官老爷。一班守旧大臣和皇族亲贵，看了这本小册子，转辗传布开去，一唱百和，攻击的言论大起。荣禄公开对人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还没有死，就是亡国也不劳他来保。他这样狂妄，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熟人入会者，叫他们当心自己的脑袋！”在这个权势显赫的荣禄恫吓下，不少人怕事退会。原来是保国会发起人之一的李盛铎（音夺 duó），看风头不对，便上疏诬蔑保国会，以求免祸。有个列名保国会的刑部官员乔树柟（音男 nán），竟写信给梁启超，否认自己加入过保国会。说“保国”二字，只有在位的亲贵大臣，才能担当得起，出于低贱的下级官吏，那是极大的不安分。御史潘庆澜便上了一个弹劾保国会的奏章，控告康有为是聚众滋事，阴谋叛乱。顽固的军机大臣刚毅，准备以这个奏章为依据，进行查究。只因光绪帝要为自己在对西太后及其一伙的争夺中，留点可用的力量，说了“会能保国，岂不大善”的话，才没有追究下去。但保国会在顽固派的压力下屈服了，不敢继续活动，自行停顿。

另一个御史又上奏弹劾保浙、保滇、保川诸会，说这些会名为保家乡，实际是制造分裂，毁坏国家，并攻击保国会。光绪帝同样置之不问，但这些会也同保国会一样自行瓦解。

顽固派并不以搞垮保国会和保浙、保滇、保川诸会为满足，直到光绪帝宣布变法后，他们仍然拿保国会做题目，加紧围攻康有为。礼部尚书许应骙(音葵 kuí)，弹劾康有为拾取外国报纸上的陈说，反对中国的典章制度，说他的建议都不可行，居心犹为险恶，要求把他驱逐回原籍。光绪帝没有接受这个要求，反而指责了许应骙。顽固派有西太后撑腰，一不做二不休，御史文悌(音替 tì)跟上来咒骂康有为设立保国会，不是保国，而是乱国，更恶意挑拨说，是“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光绪帝是知道康有为对他、对清朝的忠心的，认为文悌的奏折是受人指使，有意攻击，不能担任御史职务，罢了他的官。这也是皇帝对后党的一个反击。但是，那时硬派给保国会的罪状“保中国不保大清”，好象可怕的噩(音厄 è)梦一样，在宫廷内亲贵和太监中流传，也在宫廷外顽固官僚中流传，成为他们后来镇压维新变法运动的依据。

保国会在北京受到围攻，在武汉的张之洞也摸到了政治气候，便装出一副关心时局、折衷新旧的姿态，写出了四万字的《劝学篇》。他说，图谋挽救时局的人讲新学，担心丧失“圣道”的人守旧学，弄得众说纷纭，不知谁是谁非，因为“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现在，他这个既知“通”又知“本”的人，要出来说话了。

那末他说的“通”和“本”，究竟是什么东西？看看他的《劝

学篇》，分作“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就可一目了然。“内篇务本，以正人心”，“本”是什么？是指有关世道人心的封建伦理，即孔孟之道；“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是什么？是指有关工商业和学校报馆等事，可以变通举办，不必一概排斥。仍然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他从“以正人心”的封建伦理那个“本”出发，剽窃“保国、保种、保教”的词句，解释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要以激发忠爱，尊重朝廷为根本大计。就是坚持封建道德不能变，封建制度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如果变动这些东西，就叫做动了“本”，是绝对不容许的。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民权说”，虽然只是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争权，为不当权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争权。但它同君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是抵触的，触及了封建王朝的体制，动了“本”，所以顽固派极端仇视它，集中加以攻击。张之洞说，要是这种“民权”说一倡，“愚民”听了很欢喜，“刁民”就会起来造反，将使法纪败坏，天下大乱，是一种可怕的“邪说暴行”。他更以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为理由，说西方国家历来多暴君虐政，所以人们要提倡“民权”，要求自由、平等；至于中国，清朝的皇帝都是“深仁厚泽”，万万不可提倡“民权”，贻误天下。聚集在张之洞周围的一批腐朽文人，看到《时务报》上的“民权”说，更是嬉笑怒骂，说“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

张之洞把他用尽心机炮制的《劝学篇》送到北京，西太后看后大加夸奖。光绪帝对那些尊君权的奉承话，也很为欣赏，说这本书对“世道人心，大有裨（音皮 pǐ）益”，当即命令军机处发

给各省总督、巡抚和学政各一部，要他们广为流传。在官府的布置下，据说十天之内，就重印了几次。因为它说了些顽固派说不出的话，为守旧顽固思想提供了论据。这本书还被帝国主义分子所看中，被译作英文，改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在纽约出版。但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本书以“骑墙”的两面手法，混淆新旧，为打击维新运动张目。这是一本绝妙的反面教材。

从强学会到保国会，从北京、上海到湖南，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展的维新变法活动，都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恶毒攻击，形成维新和守旧两个对立的壁垒。洋务派原来在形式上同顽固派还有点区分，经过甲午战争，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这种形式上的区分也就更加微弱了。对于维新变法运动，洋务派虽也一时表面敷衍，骨子里却完全是站在顽固派一边，加以阻挠、破坏。张之洞的表演是很典型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同顽固派的对立，几年中，通过报纸、书刊、奏折和学堂(或书院)讲坛，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总的说来，论战的中心问题是三个：第一，是要不要变“祖宗之法”的问题，第二，是要不要废八股、提倡西学的问题，第三，是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的问题。改良派是问题的提出者，他们的答案是“要”；顽固派是问题的反驳者，他们的答案是“不要”。无论强学会的斗争，南学会的斗争，以至保国会的斗争，基本上都是对这三个问题的“要”和“不要”的论战。这场论战，是近代中国思想领域斗争的一个重要回合，给“天不变而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打开了一个缺口。

七、一百零三天的新政

一八九八年夏天，北京清朝政府里的气氛是紧张的。后党一方的顽固守旧大臣，害怕变法将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封建秩序，以西太后为靠山，想拚命把它压下去，并等待事态的演变；而光绪帝一方，依靠帝党和维新派的奔走推动，满想通过变法从西太后的控制下摆脱出来，使自己成为掌握实权的皇帝，这种要求越来越强烈。这时，拥护变法的御史杨深秀、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两次向光绪帝上书，请“明定国是”，即要求决定变法大计。光绪帝接到杨深秀等的奏章，召集军机处的亲王大臣，表示变法决心，于六月十一日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诏书中指责一些顽固官僚，装出一副“老成忧国”的样子，以为旧章必须遵守，新法应行排斥，喋喋不休，都是空言无补。现在的“时局如此，国势如此”，难道还可以照老样子行事吗？法制应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好象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纱一样的道理。新政就从这一天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政变，一共一百零三天，历史上称作“百日维新”。

为了引用新进人物，辅佐新政，就在宣布变法的第三天，光绪帝命令康有为于六月十六日入紫禁城朝见，命令黄遵宪、

谭嗣同由湖广总督护送前来北京，又要总理衙门对梁启超进行了了解，向光绪帝具报。新政正在冲破皇帝不能接见小臣的“祖宗家法”。

康有为梦寐(音妹 mèi)以求想见皇帝的愿望实现了。十六日，光绪帝如期接见了，同他谈了两个小时，是皇帝接见臣下少有的例外。他首先陈述中国在外国的逼迫和分割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帝表示同意他的话，说今天确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接着向光绪帝指出，近年来不是完全没有变法的行动，但只是少变而不是全变，办了这一桩不办那一桩，所以不能取得什么成绩。他认为所谓变法，需要把制度、法律先行改订。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他请求光绪帝统筹全局，设立制度局。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经过了三百年才富强起来，日本搞“维新”三十年就强了，中国好好变法，三年就可以自立。光绪帝说他的条陈(指《应诏统筹全局折》)讲得很详备。

康有为又询问光绪帝说：“皇上既然知道非变法不可，为什么长久没有举动，看着国家危亡？”光绪帝注视了一下帘外(防人偷听)，然后叹息说：“我受到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康有为领会了他的心思，便改变口气说：“皇上可以就权力能够做得到的先做，虽然不能尽变，如能扼要地做几桩大事，也可以救中国。不过现在的大臣大都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要靠他们来变法，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他建议：“不必尽撤旧衙门，只须增设新衙门，不必尽撤旧大臣的职，只要擢用有才干

的官员，多多接见维新志士，给以官职，准许专折奏事（直接向皇帝上条陈，不须代递），将新政诸事交给他们办理。对旧大臣保持他们的高官厚禄，使他们没有办事的辛劳，也没有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光绪帝表示同意这些见解。这里的君臣对话，活画出了一个怯懦的皇帝，一个是回避斗争的改良派君子。

康有为还对答了废八股、译书、游学、筹款等事，特别向光绪帝强调，对于变法措施，要多下诏书。他以为只要皇帝的诏书一下，新政就可朝令夕行了。

经过这场君臣间的对话之后，光绪帝准备重用康有为，使他更大程度地为新政效力，因荣禄、刚毅等人反对，又怕触怒西太后，结果只给了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文稿）这个较低的位置，但准许专折奏事。康有为抓着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提建议，有的自己具名，有的为别人撰稿上奏，极大地发挥了他的这种本领。后来编成了一本厚厚的《戊戌奏稿》。

为了增加光绪帝的变法信心和有关知识，康有为又先后呈上他写的《突厥（音决 jué）削弱记》《波兰分割记》《法国革命记》《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列国比较表》等书，各书都有序文和按语。目的是想通过这些书，使光绪帝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借鉴，懂得变法的条理秩序。陈述突厥（土耳其）的削弱、波兰的灭亡，是警告光绪帝要加速变法的步子，否则中国的命运也将同突厥、波兰一样。他的《法国革命记》，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教训光绪帝的。原稿虽已在政变中散佚，但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保留下来的这本书的序文。序文中用阴郁的笔调描写了一七八九——一八九三年法国革命的“惨状”，和盘托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内心世界。他认为法国的路易十六是个“好皇帝”，其所以被送上断头台，就是对实行政治改革拖延得太久，人民不能等待了，就革了他的命。这说明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维新变法的目的，除了挽救民族危亡的一面外，更有防止革命、抵制革命的反动一面，是与人民为敌的一面。事实上，没有人民的力量，他们叫喊的挽救民族危亡，也就完全成了空话。

七月三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给他六品衔，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梁启超只是个举人，没有做官。那时称没有官阶的知识分子为“布衣”，他以“布衣”被召见，感激得很，说是清朝“数百年所未见”的特殊待遇。八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又命令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为召见作好准备，随着先后接见了他们。谭嗣同因生病，延至九月才赶到北京，光绪帝召见他，叫他凡认为应变的事，随时条陈。九月五日，光绪帝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批阅大小官员递上的奏折，为皇帝颁发诏书拟稿，是机要工作，当时称他们为“军机四卿”。四个人中，刘光第、杨锐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的，但杨锐是张之洞的门生，与张关系密切。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当过荣禄的幕僚，康有为叫他与荣禄拉关系。只有谭嗣同是一个跟着康有为，忠实于维新变法事业的人。

在以西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清朝政

府里，康有为只抓牢一个光绪帝及少数帝党官僚，这些帝党官僚如文廷式等，又早就被西太后罢了官；而光绪帝也只抓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这样少数为他卖力的新进人物。他们君臣之间构成的唯一的一条新政渠道，就是康有为等人今天一个奏章、明天一项条陈的新政建议，流水般地传到紫禁城里，经过光绪帝，把奏章、条陈变为诏书、谕令，又一件一件从紫禁城里飞出来。一百零三天中，飞出来的新政诏书、谕令，一共是一百一十多起，基本内容如下：

一、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凡国家的会试，省级的乡试及府县的生童岁科（考秀才），旧用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各级考试定为策论、时务、四书五经三场；以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为主，不凭楷法（写字）好坏为取舍标准；在规定考试外，开设考试经世致用学问的“经济特科”，选拔新政人才。

二、设立学堂，学习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将原设的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旧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和西学的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民间祠庙，不在规定范围之内的，一律改为学堂；还下令筹备设立铁路、矿务、农务、茶务和医科等专门学堂。

三、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凡王公贵族能留心时务，有志上进的，分别派往外国游历，增长见识；各省挑选学生分送日本大学堂、中学堂及矿务学堂学习。

四、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各省士民著作新书，创行新法，制成新器，合于实用的，均给奖赏，或量才授予实职；新制

品，在规定年限内，准许本人专利售卖。

五、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要上海等地所出的报纸，有关时事内容，随时送呈皇帝；各报体例，在于增广见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议论，不必意存忌讳；批准在北京设立报馆；允许官民上书发表意见，严禁官吏借故阻止。

六、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在京城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农工商分局；各省可耕之地而未尽地利的尚多，务必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开垦；总理衙门应制订有关制造的奖赏章程；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筹设商学、商报、商会各项组织，逐步推广；茶丝为出口大宗，应分别设立公司，采用西法制造，以利行销。

七、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芦汉铁路非常重要，应赶快兴工，粤汉、沪宁各路也应迅速开办；铁路、矿务的业务繁重，在京城设立铁路、矿务总局，所有各省开矿、筑路的事，均归总局统一管理。

八、广办邮政，裁撤驿站。在京城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各省府州县也一律举办，邮政局设立后，原设驿站由总理衙门和兵部会商裁处。

九、改订规章条例，精简机构，裁减不必要的官员。各部院对该衙门的章则条文应行检查，凡语意混淆，烦琐难行的，通通删除，另订简明条例，切实施行；裁撤管皇室家务的詹事府、管理内外章奏的通政司等衙门，所管事务并入有关机关办理；裁撤总督、巡抚同在一城的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所管各事，由当地总督兼管。

十、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对征税、厘金、军饷及收支款项等，均分别进行整顿，订立章程；编制预算决算，户部将每年出款入款，编制表格，按月刊报。

十一、精练海陆军，改用新法操练。各省军队和八旗一律改练洋操，按照西方国家兵制，改订新章；各省机器局生产的枪炮弹药，须统一规格；裁汰练勇，挑留精壮，勤加训练；沿海各省增加水师学堂名额，添置练船，以培养海军人才。

十二、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旗人原由国家供养的特权，让他们参加士农工商等职业。

这些新政，看来范围很广，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个方面的内容，有的是除旧，更多的是布新。但只是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在封建国家的衰老躯体上，缀上零零落落的资本主义花环而已。

资产阶级改良派叫嚷了多年的所谓“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治，要求同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皇帝分享政权，是资产阶级改良方案中带全局性的东西。在实行新政期间，康有为还替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写了《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要求“立行宪法，大开国会”，送了上去，却没有变为新政诏书颁发下来。随后，康有为、阔普通武又各自上奏，续请仿照西方，定期召开国会，选才议政，都无下文。证明光绪帝对于新政建议，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是以有利于他的皇权统治为取舍标准的，如果削弱了皇权，他是不予采纳的。他虽也说过如能有益于国民，他这个皇帝没有权也无妨一类的话，那是装点门面，用来大言欺世的，而他表示如不予以“人君实权”宁可“逊位”的话，

才是道出了他的真实要求。他对张之洞《劝学篇》的重视，也正是从这里着眼的，因为《劝学篇》也谈“改革”，也谈“变法”，却痛诋“民权”，拥护君权。那就是说光绪帝真正能够接受的，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是一个“洋务皇帝”。

就是这些枝枝节节的改革，能够做到的也不多，大都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康有为等人把皇帝下诏书看得极为重要，以为只要依靠最大的封建权威——皇帝的命令，就可以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东西。但是以西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并没有将这个虽然早已当政的皇帝放在眼里。各省的总督、巡抚，除了一个湖南巡抚陈宝箴还能执行新政外，其他都是些抗拒新政或阳奉阴违的人，他们等着瞧。光绪帝曾经下过诏书，奖励陈宝箴，也下过诏书斥责办理新政不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锺麟，但这种奖励和斥责，对那些狡猾的封建官僚，并不发生什么刺激作用。

八、顽固派发动政变

当决定变法的诏书颁布后，光绪帝和西太后、帝党和后党之间的争权斗争，更加剧烈起来。光绪帝抓着下诏书、盖玉玺（音洗 xi，皇帝的印章）的权力，在不断发布新政诏书的同时，引用了一些新进人物，也斥退过几个反对变法的旧大臣。西太后和后党感到这是对他们的最大威胁。几年来，西太后因为光绪帝这个由她立起来的儿皇帝渐渐大了，不听话了，就想把他废掉，这时越发按捺不住，便串同顽固大臣荣禄等，着实部署力量，准备发动政变。

就在变法诏书下达的第四天，在顽固派头子西太后的威逼下，光绪帝以自己名义，一连下了三道预告新政危机的命令：一是撤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职务，送回江苏原籍；二是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要谒见西太后，向她谢恩；三是调直隶总督王文韶回京供职，派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这三道命令替顽固派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工作。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唯一亲信大臣、帝党首领，在光绪帝和维新人物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所以给他的罪名是“取悦于皇上”、“揽权

狂悖(音倍 bèi)”，把他撵走，就是孤立光绪帝。西太后早已归政，照例不应接见大臣，这时她不管“祖宗家法”了，要大臣向她谢恩，是把用人大权抓到自己手中来，准备再度临朝听政。荣禄是西太后的老搭当、头号亲信，西太后不要他留在身边担任大学士，却调他去做直隶总督，那是因为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拥有重兵，可以控制北京的政局。

当荣禄还没有出京，西太后又和他商定在秋天要光绪帝陪同她去天津阅兵，到时便以兵力逼迫光绪帝退位，另立由她完全控制的新君。西太后掌握了北洋三军的武力还不够，进一步把京城和颐和园的警卫权也抓到自己的手里，先后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任命怀塔布管理有关颐和园的警卫事务，任命刚毅管理健锐营，这些人都是她的忠实奴才。步军统领是掌管京城正阳、崇文、宣武等九门守卫巡警职务的，又称九门提督，连一、二品的大员对他也有三分畏惧；健锐营是清朝的禁卫军之一，是直接管制北京的武装力量，担负着宪兵的职务。

那时候，西太后住在颐和园，光绪帝住在紫禁城，光绪帝常要去颐和园向西太后请安，借以观察西太后的动静，在颁行新政的一百零三天中，就去请安十二次。西太后则在内廷布满了她的亲信太监，监视光绪帝的行动，稽查宫门的出入人员，虽王公大臣，也须检查后才能放行。紫禁城由步军统领派出八旗官兵把守，遇到他们认为可疑的人，立刻报告西太后。西太后掌握了紫禁城的一切活动。

推行新政，当然不能不触犯一些人的利益。譬如八股文的废除，使大批八股士人倚为身家性命的敲门砖，一旦变为无用，简直是比挖了身上的肉还要疼，哪里甘心，于是群起攻击新政。湖南有个叫曾廉的举人，甚至上书请求处死康有为和梁启超。废淫祠、停书院的命令发出后，许多土豪劣绅和尚道士失去诈骗勒索的工具，就到处散布破坏新政的言论。一些衙门裁撤后，大批丢掉了乌纱帽的官员，更是惶惶如丧家之犬，极端仇恨新政。所有这些腐恶社会势力一齐集结在西太后的周围，都想反扑过来，扼杀新政。

九月初，光绪帝和西太后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光绪帝很想打破顽固势力对新政的顽抗，为自己立点威。四日，他赫然震怒，下令撤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个大官的职。

事情是这样：有个礼部主事王照，给光绪帝写了个斥责守旧派的条陈，劝光绪帝游历日本，吸收新政经验。怀塔布等不肯代奏。王照不服，抗议他们违背光绪帝开放言论的宗旨，说他们不肯代递，将径投都察院转呈。许应骙反咬一口，说日本素多刺客，王照要“皇上”去日本游历，是有意置“皇上”于险地；又说王照借端要挟，咆哮公堂，因此闹得很凶。光绪帝知道了，认为怀塔布、许应骙等是大臣霸道，压制下级，便罢了他们六大员的官；并称赞王照“勇猛可嘉”，提升了王照的职位。怀塔布的老婆常在颐和园侍候西太后，很得西太后的欢心。事情发生后，她哭诉于西太后，西太后要他们夫妇暂且忍耐。

七日，光绪帝又将阻挠新政的李鸿章、敬信从总理衙门撵

走。

后党认为时机到了，纷纷出动。怀塔布和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相继赶往天津，与荣禄阴谋策划。十四日，旗人自谋生计的诏书发下，满洲贵族借端煽动，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大臣立山，率领满员前往颐和园告状，说皇帝不要满人了，请太后临朝训政。这时，西太后和荣禄的密谋更为加紧，京津道上西太后的亲信来往不绝。荣禄还突然调聂士成军队移驻天津，又叫董福祥的军队移驻长辛店（离北京彰德门四十里），发动政变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光绪帝觉察到了这种严重形势，于九月十四日由杨锐传出了一道“密诏”，说“今朕（音镇 zhèn）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七日，又由林旭带出了第二道“密诏”，借题要康有为去上海督办官报，严令康有为“迅速外出，不可迟延”，留着性命，将来好为他这个“皇上”出力。第一道“密诏”是要康有为等救他，第二道“密诏”是要康有为赶快离开北京的险恶环境，却是他救康有为。事隔三天，光绪帝为什么由自己呼救，转而要期待救他的人“迅速外出”呢？因为杨锐读了第一道“密诏”，眼看大祸临头，吓得六神无主，竟将“密诏”搁置在他那里，到第二道“密诏”出来，才由林旭一起传到康有为的手中。徬徨焦急的光绪帝，等待援救妙计，毫无消息，而事态演变，越来越险，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康有为赶快逃命。

康有为、谭嗣同等读了“密诏”，痛哭一场。这些君子们究竟怎样“妥速密筹”，去营救他们的“皇上”呢？“密筹”的结果，

不仅把他们的“皇上”的命运，而且把他们自己的命运和新政的命运，全都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拥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

九月十九日上午，康有为在整理行装后，赶紧去找李提摩太求救，李提摩太便领着康有为去见英国公使，不料英国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扑了空。又去见才到中国不久的日本大政客伊藤博文，请他向西太后说几句话，以缓和对光绪帝的压力。康有为做完了他能做的一切，向他的“皇上”表了忠心，便化装逃离北京。

向英、日帝国主义求救，光绪帝虽然没有在“密诏”中明白写出来，其实是心照不宣的，他曾口头指示林旭去请英、日相助。李提摩太由上海来到北京，康有为曾建议请李提摩太任顾问大臣，李提摩太向康有为保证，说他“可以向英国政府说项，取得英国的支持”。这些话当然传进了光绪帝的耳朵。康有为和日本公使林权助也早有联系，当伊藤博文借“游历”为名，于九月十四日的紧张气氛中来到北京，是别有用心，康有为等人竟想请他做指导新政的“客卿”。光绪帝在接见伊藤时，也希望他无保留地将日本维新的“改革顺序方法”告诉中国，想同日本拉上关系。对光绪帝和康有为这些人来说，此时此刻把英、日帝国主义当作“救星”，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光绪帝早已是英、日帝国主义所要扶植的对象，而康有为等人也是英、日帝国主义所要利用的力量。

他们又怎样去找另一个“救星”——当时尚未崭露头角的封建军阀袁世凯呢？

袁世凯做过强学会的会员，他拥有一支七千人的新练武装，驻扎在离天津七十里的小站，距北京也不算远。当西太后的天津阅兵密谋泄露出来后，康有为就有意把袁世凯拉到光绪帝一边来，以便对付荣禄。康有为派了他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去小站，同袁拉关系，并写了一道密奏，由谭嗣同上递，向光绪帝推荐袁世凯。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传令袁世凯到北京去见皇帝。九月十六日，光绪帝在发出求救“密诏”的紧张时刻，接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派他专办练兵的事。接见后，袁世凯立即去拜会顽固的军机大臣刚毅、裕禄、王文韶等，以求得后党的谅解。他还请示王文韶，是否有上疏力辞的必要？王文韶劝他不要这样做，说这是出自“特恩”，辞也没有必要，反露痕迹。于是袁世凯立刻具折感谢皇帝的重赏，将力图报答。因此，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帝的“密诏”后，决定分头进行，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林旭写了一首小诗给谭嗣同，说对袁世凯这个“健者”不可“轻言”，就是说对袁世凯这样的“强人”不能轻信。但是事已临头，他们认为“可救（皇）上者，只此一人”，别无可以商量的对象，只好带着极为危险的侥幸心理，寄希望于袁世凯。

十八日夜间，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袁的住处）。谭嗣同说了几句试探的话，问袁知不知道天津阅兵的密谋，接着便把来访的目的，坦率地端了出来，要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皇上”，可以立下很大的功勋。并以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欲救‘皇上’，向颐和园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竟激昂地说：“你把我袁某

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要担当的。”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军营里，杀一个荣禄就象杀条狗一样！”随后，他又做出很慎重的样子说，事情这样紧迫，得先回天津去，调换几个军官，贮备一些弹药。谭嗣同满以为策划成功，再向这个刚刚结作“战友”的袁世凯叮嘱一番，在深夜里辞别了法华寺。

二十日，光绪帝又一次召见袁世凯。在奏答时，袁世凯不阴不阳地说：“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这是为他自己日后推卸罪责埋下的伏笔。当天傍晚，袁世凯赶回天津，直投总督衙门，把谭嗣同的策划向荣禄告密。列宁说：“当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制度，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是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所支持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受拥护旧制度的人们愚弄的。”^①改良派的被出卖，谭嗣同的被出卖，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去寻找能够冲破旧制度的巨大力量——人民群众，就必然受到拥护旧制度的人们的愚弄。

荣禄得到袁世凯的密报，大惊失色，立刻挂专车到北京，飞奔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袁世凯对荣禄立了一大功，对西太后立了一大功。从此，他以“才堪大用”得到以西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宠信，很快被推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高位。插足维新活动，回过头来出卖维新人士，取得富贵，这就是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表演的丑剧。

^①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八页。

二十一日凌晨，西太后从颐和园急急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帝寝宫，吆喝光绪帝说：“我抚养你二十多年，竟听小人的话，要谋害我！”光绪帝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这个意思。”西太后恨恨地骂道：“蠢东西，今天没有我，明天还会有你吗！”便拿走一切文件，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的瀛（音迎 yíng）台，接着用皇帝的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西太后又一次“临朝听政”。

政变发生时，梁启超、谭嗣同等还聚集在李提摩太的寓所，同这个英帝国主义分子商讨挽救的办法。他们决定由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可是急病碰上慢郎中，英国公使还在北戴河未回，美国公使也在西山度假，没有联系上。梁启超虽然会见了日本公使林权助，除了听到一些表示“同情”的外交词句外，这些帝国主义者只是观察事态的发展，以便左右逢源，从中操纵。

顽固派想利用政变把维新力量一网打尽。当日，崇礼领兵围南海馆，抓走了康广仁。康有为已事先出京，在英国人掩护下，才摆脱追捕，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逃出北京，直奔日本。二十二日，荣禄派兵三千名，封锁北京各城门，断绝交通，搜捕维新人士和帝党，许多人被捕下狱。二十八日，下令杀死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六人，人们称之为“戊戌六君子”。但他们生前的情况既不相同，临死的表现也很不一样。其他大批参预新政和倾向变法的官员，有的被革职，有的被放逐。顽固派发动的政变，结束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维新变法运动。

“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① 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是一个立志改革的人，他不怕杀头。在他被捕前，人们劝他逃亡日本，他却把自己的书稿，送交决定东走日本的梁启超，说：“没有逃命的人，谁来图谋将来；没有死难的人，又怎样报答圣明的皇上！”他等待逮捕，并写出“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诗句，表现临死不惧的精神。但他是为谁“横刀”？是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横刀”，是为报答他的“圣主”流血，这是他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的流血不是宣告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开始，而是宣告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结束，证明改良主义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政变后，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新政都被宣布取消。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第五〇七页。

九、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是一条失败的道路。

这次政治改良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尝试，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来自两种社会力量，一种是随着洋务派举办的民用工业，由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进至商办，若干地主、官僚顺着这条道路转化为资本家，或兼有资本家的身份；另一种是少数手工工场主或中小商人开设工厂，发展为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的后期，前一种居优势，后一种主要是华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正是代表前一种人的要求，是作为这种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出场的。他们自己就是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身份，向资产阶级的道路上转化。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要求和所受的教养，规定了他们不可能超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更前进一步。

改良运动的产生，总是对抗革命、企图缓和社会矛盾，本质上是反动的。改良主义者鼓吹改良，又害怕群众运动，这是

他们不可救药的顽症。他们害怕群众革命运动，更甚于害怕顽固反动势力。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在开展变法改良的活动中，就一再以“金田起义”作为教训，以“民变”纷起当作警钟，把革命斗争描写得阴森可怕，要用变法改良的手段，来制止这种“可怕”事变的发生。这就使他们远远地离开人民群众，找不到能够真正打破一切旧势力的同盟军，只能借皇权的威力去推行新政，到愿意接受维新变法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去寻找力量。竟想凭借这样一种力量，依靠极少数人的努力，去完成革新社会政治的艰巨事业，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

对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下的民族命运，是那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关心的课题。康有为的七上皇帝书，是在三次民族危机的狂潮中出笼的，第一次是中法战争后，第二次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中，第三次是瓜分的形势出现时。说明他的活动，是和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紧密呼应的。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注意时局，关心民族命运，发表变法言论，参加改良活动，也都是在甲午战争的强烈震动下开始的。经过长期的摸索，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外国是可以学的，也是应该学的。但是，有一个怎样学、学什么的问题，是学了用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是把学当作投靠？资产阶级改良派以为只要把外国的东西移植过来，革新内政，自强起来，就可以消除外患。并且企图依靠几个帝国主义来抵制另外的帝国主义，根本不认识中国不反对帝国主义，就没有独立自主的改革，不

认识帝国主义对中国分裂剥削和阴谋利用的两面手法，错误地把英、日、美三个帝国主义看作可以帮助中国革新的“友邦”。这就制定了一条与他们自己的“救国”要求相反的外交路线，这条路线无疑是使中国仍然走不出半殖民地的死胡同。

我们说改良主义的本质是反动的，不仅因为它反对革命，还由于它用改良的手法来保护旧事物，使旧事物得免于死亡，较之顽固派死抱住旧事物不放，虽有所不同，却富有欺骗性。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同顽固派作斗争，表现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的时候，也毫不改变这种本质。不过在十九世纪末年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才开始，人民群众的斗争仍然处于感性的自发状态，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而中国那时所面临的，是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惊涛骇浪的现实，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又是那样顽固、腐朽、黑暗，资产阶级改良派想改变这种状况，主张摔掉八股文，发展工商业，搞点立宪政治，对封建统治和封建思想的桎梏，进行了冲击，使闭塞的中国社会，透进了一点新鲜空气和阳光。应该说，在历史上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列宁说：“任何改良之所以为改良（而不是反动的或保守的措施），正因为它是趋向改善的一个一定的步骤或‘阶段’。”但是任何改良，“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扑灭革命斗争，分散革命阶级的精力，模糊他们的认识，等等。”^① 在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就是这样一种“步骤”或“阶段”。

^① 《不应当怎样写决议》，《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二二页。

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走的是一条抱住一个皇帝而脱离人民群众的道路，决定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当封建顽固势力联合反击，他们便一触即溃，败下阵来。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器库里拾起来的所谓“新学”，也在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阶级的崇古思想打击下，化成败鳞残甲，失去了活力。但是，“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①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时，它是作为旧事物的对立面出现的，对旧事物作过斗争，掀起过全国性的政治风浪。尽管这种斗争非常有限，但是不可能不在思想领域中产生影响。那就是戊戌变法后，人们的民主要求增长了，怀疑旧学、欢迎新学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以西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取消了新政，却取消不了由新旧斗争产生的思想影响。

变法改良运动失败后，在参加当时政治社会活动的许多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换了脑筋，开始抛弃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上推翻清朝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行列。可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头目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后，并没有接受失败的教训，从此醒悟过来，改弦更张，却仍然死抱住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不放。康有为拿着政变时光绪帝给他的“密诏”，视为“法宝”，在海外招摇撞骗；梁启超到日本主编《清议报》，编写《戊戌政变记》，宣传他的“皇上”的“圣德”；被誉为维新派激进分子的谭嗣同，在他留给梁启超的绝命书中，还指望有一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七页。

两个忠臣义士挺身而出，效法唐朝徐敬业讨伐武则天那样，举兵讨伐西太后，把作了囚徒的光绪帝解救出来，重登帝位。唐才常充当了徐敬业，执行了谭嗣同的遗命。这就是一九〇〇年八月，唐才常等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几省，发动的自立军起事，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最后一试。

自立军起事的经过是这样：

顽固派发动政变前，谭嗣同在北京做了军机章京，招邀唐才常前往北京参加新政机要。唐才常应邀北上，刚到汉口，就听到政变发生，谭嗣同牺牲。他非常悲愤，折回湖南，处理一些事务后，便东渡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会商，决定联络长江两岸的会党，把反清的会党群众引向他们起兵勤王（援救皇帝）的邪路上去。那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组织武装反清力量，已在长江流域各省的会党群众中进行工作，为此唐才常也取得了同孙中山的联系，说什么他们的起兵勤王，同革命派的武装反清，可以“殊途同归”。

一八九九年，唐才常同曾在湖南时务学堂学习的留日学生林圭回到上海，设立正气会，作为策划起事的机关。唐才常在正气会宣言中，既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反对清朝统治的话；又说“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等坚决拥护光绪帝的话。这种自相矛盾，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混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进行欺骗的手法。不久，唐才常接受康有为的指示，改正气会为自立会。因为“正气”两个字来自文天祥写的反抗元朝的《正气歌》，有反对清朝贵族统治的嫌疑，与改良派的拥清宗旨相违背。自立会随即联络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的哥老会

和清军部分士兵，组织自立军。

一九〇〇年七月，反抗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高涨，清朝政府处于混乱状态，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正在同帝国主义勾结，倡议“自保”。唐才常为了利用这个形势扩大自己的影响，造成勤王的声势，在上海英“租界”召集维新人士开会，名曰“中国国会”。那些在政变后躲起来不敢露面的维新人士，又跃跃欲试了，容闳、严复、文廷式、章炳麟等数百人到会。宣布宗旨三项：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第二项是敷衍革命派和会党的反清要求，第三项是保皇，是自立军的主题，与正气会的宣言一样陷入矛盾。章炳麟劝唐才常取消第三项，唐不听，章炳麟当场把自己的辫子剪掉，表示对保皇的抗议。说明改良主义的谎言，已不能再欺骗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了。

“国会”召开后，自立军在武汉设总机关，决定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分七军同时举兵起事。唐才常没有记取谭嗣同被袁世凯出卖的血的教训，曾经通过日本人向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说话，请张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佯许不干涉自立军的行动，也不明说接受自立军的拥护，表示默许；却在自立军起事的八月下旬，联络汉口的英国领事，调亲军营伙同英“租界”的巡捕，包围了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总机关。唐才常等多人被捕，同遭杀害。张之洞还捕杀了其他许多自立军分子，湖南巡抚也乘机兴狱，大批捕杀自立军和维新人士。



2 037 8635 9

资产阶级改良派号称的自立军，根本不可能自立。他们依赖帝国主义，依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地方实力派，结果被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串通起来，投于血泊中。历史又一次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出了严峻的结论：此路不通！

此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头目康有为、梁启超继续坚持保皇，疯狂反对革命，成为完全的反革命派。